

艺术与城市文化漫谈

□ 段秀芳



艺术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私人生活领域，艺术欣赏或艺术创作是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人们看电影看电视，观看音乐会、戏曲、话剧，徜徉于博物馆、美术馆，进行阅读、写作，从事书法、绘画创作等，通过各种形式的艺术欣赏和实践活动，开展社交、愉己抒情、修身养性。在公共生活的领域，各种建筑艺术和景观更是城市文化中无处不在的重要角色。如华丽巍峨，飞檐层叠，“如鼓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的紫禁城。“嘉树荣而佳卉茁，奇石显而清流通，凉台燠馆，风亭月榭，高高下下，迤邐相属”的苏州留园奇景。流光溢彩的东方明珠与群厦高楼耸立的上海外滩景观。……城市艺术表征着市民丰富而多元的生活方式与公共社会空间，是城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伟大创造，也代表着人们的审美观念与文化期望。

伴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城市艺术的形式更加丰富。在当今城市建设中，现代设计艺术元素无处不在，建筑、器物、服装、影像、广告、包装等体现的艺术风格多元而精彩。但无论艺术形式如何多种多样，都不能忽视一个关键。那就是，城市文化中的艺术表现，应该是城市精神的集中反映，城市艺术对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的影响举足轻重。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考察时，来到有百年历史的荔湾区西关历史文化街区永庆坊。他指出，要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这是对城市建设要保留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形式，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必须受到重视。传统文化艺术包括建筑、雕塑、刺绣、绘画等类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被传承保护，更要通过与当代城市文化建设相结合，体现出鲜明的城市精神特质，使其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做到这一点，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和传统是艺术创作最为厚重的文化底蘊。如作为湖北省武汉市的历史文化名片和城市标志，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经历代多次兵燹水火又多次重建，我们目前看到的黄鹤楼重建

于1981年，历经4年落成，是在清同治时期的原型基础上设计建造的。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登上黄鹤楼，在这里思接千载，吟咏悲欢。唐代诗人崔颢曾题下传诵千古的名作《黄鹤楼》，诗仙李白写下“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名句。黄鹤楼精美的雕作刻工、端庄大气的建筑风格也渗透着传统艺术之美，历史的厚重让这座建筑在现代城市中璀璨生辉。在草木繁盛的广州越秀山木壳岗，矗立着由著名艺术家尹积昌、陈本宗、孔繁纬于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五羊石像。相传上古时候，有五位仙人骑着五头山羊降临广州，山口衔谷穗赠给当地民众，从此当地风调雨顺、丰产富足，故广州也别名为“羊城”。五羊石像，就记载了这个古老的传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羊”也是吉祥之物，能给人们带来幸运、美好。汉代《说文解字》有载，“羊，祥也”，“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五羊衔穗，寄寓了广州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五羊石像成为广州城市的标志。半个世纪后，五羊石像又成为2010年在广州举办的第16届亚洲运动会的会徽……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积厚流光，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血脉中涌动奔腾的汨汨热流，是华夏子民相同的基因密码，是祖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代城市艺术创作中必须自觉地传承发扬。

赋予鲜明的时代精神。融入鲜明时代特征的艺术创作，能够获得时代的生机和活力。如，20世纪70年代末，深圳还是南海之滨的一个小渔村。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深圳经济特区经过40多年高速发展，现成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创新力的大都市。坐落于原深圳市人民政府门前的开荒牛雕像，代表着特区人民埋头苦干、勇于开拓、务实进取的创业精神，成为深圳精神的象征，收获了“一座雕塑，读懂一座城”的美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忠厚、勤恳、耐劳品格意象的牛，与特区人民的艰苦创业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获得了新的艺术升华。艺术创作的背后，是社会物质基础的支撑，是社会发展与时代精神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因时代精神的注入而增添活力，艺术创作也因被赋予时代精神而大放异彩。



广州五羊石像



深圳开荒牛雕像

再比如，现代城市中戏曲受到的关注度较传统社会有所下降，但是江苏省苏州昆剧院近年来排演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让观众耳目一新，受到了广泛赞誉和欢迎。该剧在保持原剧主题和传统戏曲精华的基础上，把现代歌剧的音乐技法用到戏曲音乐中，并在舞台灯光、服饰、舞蹈等方面也巧妙融入现代元素，实现了古今艺术手法的完美嫁接，较好地表现了民族艺术的独特性、创新性和生命力。

此外，还要创新艺术的表达形式。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市场传播技术和能力空前发展，艺术作品也可以工业化的方式批量生产，成为大众精神生活的快速消费品。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消费利润的驱动，加强了艺术的推广力，但由此也出现迎合大众消费的平庸化倾向。城市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美”的格调、“美”的内涵、“美”的表现，远离庸

俗化。同时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实际，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手段，在表达形式上积极创新。比如近年来，江苏苏州镇湖创建的“苏绣小镇”立足于得天独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才优势，聚焦苏绣产业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传统的苏绣作品大多吸取书画艺术中的精华，以针代笔表现形象与色彩。如今，这里的苏绣大师开始探索吸收当代艺术元素，将极简主义风格带入苏绣创作，彰显出苏绣新的面貌。越来越多的创业者也开始把传统的刺绣工艺，融入文创产品中。传统与现代方式相结合，令这一传承了千年的古老工艺焕发出全新的魅力。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出自《韩非子·有度》，这里的“绳”是指中国传统木匠用来打直线的墨线，“绳不挠曲”原意是说墨线不向弯曲的地方倾斜，如果墨线没有拉直，木匠活也就无法正常进行。韩非认为法律要时刻保持公正，不能偏袒权贵，否则法律将形同虚设。作为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思想深深影响了秦王朝政，嬴政在秦国推行法家思想，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韩非在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后，又具体指出，“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意思是说惩罚罪过不避让大臣，赏赐善行不遗忘百姓，惩罚和奖赏应一视同仁，不应因人的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为很多清官能吏所认同。西汉文帝时期，名臣张释之任廷尉，有一次一个人无意中冲撞了汉文帝的车队，拒绝了汉文帝从重治罪的命令，而只依法判处罚金。唐太宗时期，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入东上阁议事，因未解佩刀犯“卫禁律”。事后，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判长孙无忌罚金而判负责监管的监门校尉死刑。大理寺少卿戴胄认为二人皆是疏忽致罪，不能因为身份差异就在处罚上生死悬殊，最终监门校尉死罪得免。作为中国古代清官代表形象的包拯，在权知开封府时，城外惠民河发生水患，毁坏屋舍上万间。包拯调查后发现水灾的原因在于王公贵族多在水岸违法筑造亭台水榭，侵占河道，致使水流不畅。包拯不惜得罪权贵，下令将两岸楼台悉数拆除，还一个清静水域。

中国古人的观念往往来自法观天地的结果。《周易》中讲到，古人观察到自然界的雷电现象迅猛分明，使万物显现，不能怀邪，由此悟得刑罚首要在于公正二字。“法不阿贵”所强调的实际上也是法律的公正性问题。公开立法是确保法律公正性的第一步。郑简公时期，子产执政郑国，将郑国的法律铸在鼎上作为常法以昭示百姓。子产这一举措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当时上层贵族施用刑罚多为“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在这种情形下，法律只是作为参考的依据。这样执政者的个人素养在审判过程中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当时礼制衰微，德教不行，子产此举实是规范“人治”的无奈之举。子产铸刑鼎后，各诸侯国纷纷效仿，均公布了各国的成文法。此后，中国古代历代建朝之初即颁布成文法成为一项重要举措。

确保法律公正性的第二步在于有公正守法的官吏执法。明朝著名清官海瑞自号“刚峰”，取刚强正直、不畏强权之意。他极厌恶当时官场贪污受贿的风气，朋友的贺礼一概回绝，朝廷的利益更是一分不占。清朝名臣于成龙，其自身廉洁有守，为整治地方官吏僭越法度的不良风气，制定《新民官自省六戒》的官吏准则，被康熙皇帝赞许为“天下第一廉吏”。《史记·循吏列传》《汉书·循吏传》等古代典籍中记载了多位奉公守法的官吏故事。他们公正执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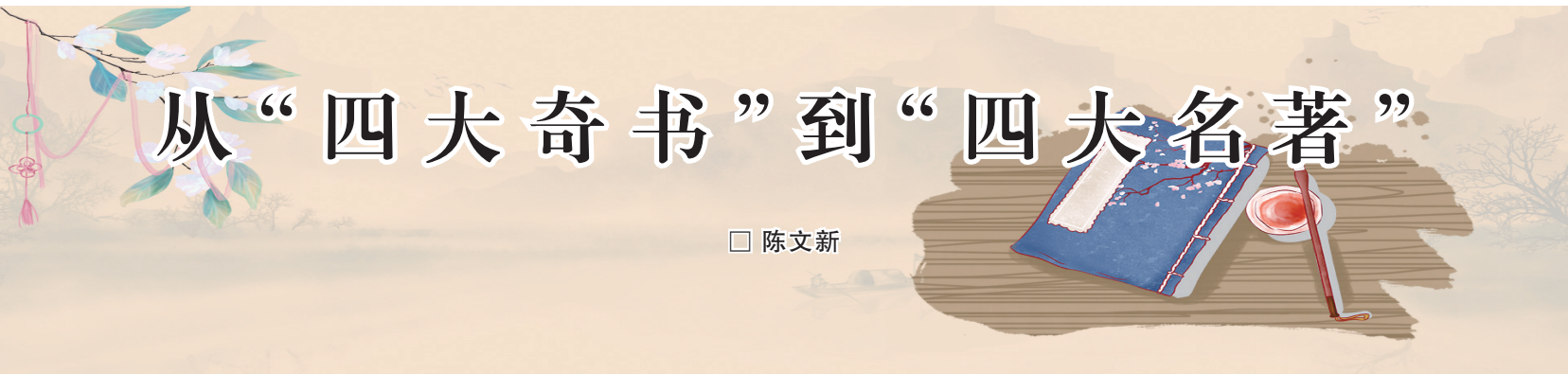


□ 黄少雄

故事通过史书或戏曲、诗词、歌舞等形式流传下来，为后世所赞叹和效仿。

中国古人认为，“曲法”现象的根源在于私心作祟。私心常常表现为对物质享受的贪求，这种物欲之私会妨害人的公正之心。东汉杨震“四知拒金”的故事广为人知，杨震拒绝故交的报恩金，申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态度，表现了古代循吏的自律与审慎。《大学》有言：“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其意是指治理国家不能以捞取私利为追求，而应当以仁义为根本。执政者的本职在于奉公执法，如果心思全在私利上，既有违公心，亦难免会以权谋私。因此古人认为，维护法律公正、解决权贵违法乱纪现象的根本之处在于去“私”。

法律的公正性对上体现为不阿权贵，对下就体现为慎法，慎法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周朝就出现了老幼残疾者可以适当免刑的“三赦之法”。《管子·正世》有言：“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因此施行统治“莫贵于得齐”，要掌握好度，能够惩治奸邪、处罚必信，使百姓畏法自正就可以了，切不可亟疾苛察甚至酷刑暴虐。慎法是古人“刑德相辅”观念的展现。“刑”与“德”是治国的两个关键手段，其中刑罚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道德教化使人无作恶之心。



□ 陈文新

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书籍。“五经”“四书”和“四大名著”在中华文化经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汉代确立了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宋代确立了以“四书”为核心的经典格局，“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则始于晚明，而确立于五四运动以后。

追溯“四大名著”说法的来源，首先就要提到“四大奇书”。“四大奇书”的概念形成于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是明代四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合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这四部书常被论小说者并提，至清初，李渔明确提出了“四大奇书”的概念。他在为两衡堂刊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序中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字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记》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李渔之后，“四大奇书”成了小说评论中的常用术语。

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概念的提出，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四大奇书”其实是比照儒家经典“四书”来命名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大正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则是“四大奇书”，一“正”一“奇”，足以相提并论。在清代中叶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之后，去《金瓶梅》而取《红楼梦》，逐渐形成了“四大名著”这一约定俗成的称呼。其中，《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的代表作，《水浒传》是英雄传奇的代表作，《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是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的代表作。

“四大奇书”之“奇”，是与“四书”之“正”相对而言的。这种相对性，既表现为语言形式的不同，“四书”用的是文言，“四大奇书”用的是白话；也表现为内容重心的差异，“四书”代表的是大传统，偏于政

教，“四大奇书”代表的是小传统，偏于“人情”。清初刘献延在《广阳杂记》卷二中说：“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塞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刘献延是清代的地理学家，他注重实地考察，对历法、数学、音韵等方面研究都有贡献。他的这段议论表达了两个信息：一是主张要在小传统的基础上确立新的文化经典，二是强调新的文化经典的确立要“原本人情”。“原本人情”是对“四大奇书”文化特征的鲜明揭示。

“四大奇书”与“四书”既有相对性，也有统一性。作为儒家文化经典的“四书”，之所以在宋代取代

了“五经”的地位，是因为“四书”把儒家的三个核心理念作了更为集中、明晰的表达：一是民本思想，对“民”的地位和重要性给予充分肯定，并认为治理国家一定要亲民、爱民；二是在官员选拔方面，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三是加强个人修养，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文化精英，都应自觉砥砺人品。并非偶合，这三个理念在“四大奇书”中也是内容重心：《三国演义》何以“尊刘抑曹”，就因为刘备更加符合老百姓对“仁君”的期待；《水浒传》中林冲等人的遭遇，都是在“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被破坏的境况下发生的；而《西游记》的主旨，如晚明诗人谢肇淛在其所著的《五杂俎》中所说，是“收放心”，即控制欲望，不要被个人欲望所支配。“四大奇书”以“原本人情”的方式传达儒家理念，有着“四书”所不具备的特殊魅力和效果。

“四大名著”中有《红楼梦》而没有《金瓶梅》，这种选择，不仅因为《红楼梦》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也因为《红楼梦》提出了许多现代读者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比如，在人生道路和配偶的选择方面，个人是否有自主权？贾宝玉渴望获得自主权，却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只能出家了事。贾宝玉一生下来，他的人生道路就因为家族的需要而被确定了：他必须做官。身为荣国府的公子，他享受了这个家族给他的荣华富贵，也有责任为家族荣华富贵的延续尽责。然而就宝玉而言，他既没有兴趣做官，也没有能力做官。

不适合做官的宝玉，在文学艺术方面却极有天赋。他给大观园所题的那些匾额、对联，他就这些匾额、对联所发的议论，都着实令他的父亲贾政感到得意。宝玉的学养也不同寻常，他对于《文选》的精熟程度也是相当深的。宝玉还是一个出色的书法家。如果宝玉可以根据自己的擅长和

兴趣选择人生道路，他绝不是一个平庸的人。可是他沒有这个权利。宝玉的尴尬，验证了清中叶郑燮《南朝》诗序中的一段话：“昔人谓陈后主、隋炀帝作翰林，自是当本色；燮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或如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中所说：“宋太祖曰：‘李煜好个翰林学士，可惜无才作人主耳！’秀才郭麐《南唐杂咏》云：‘我思昧昧最神伤，予季归来更断肠。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曹雪芹、郑板桥和袁枚，这三个同时代的人，都对人生道路的自主选择问题有所思考，而曹雪芹的思考和表达是最为深切、最能影响读者的。

由此可见，“四大名著”之所以享有崇高经典地位，自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四大名著”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性日渐突显，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四大名著”的一些重要章节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并列入国民教育的“课外阅读书目”和“建议性课外读物书目”，体现出国家对中华文化经典的重视。“四大名著”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程度，与其经典地位是大致相匹配的。

